

## 经济下行不足忧

## 模式转型逢机遇



在改革开放的第30个寒暑，中国经济迎来了最为困难的年景。就宏观经济而言，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最大的困难在于经济下行的风险，有迹象表明经济增长正在从二位数上滑落。更令人担忧的还在于下滑速度之快以及下滑趋势的形成。调控部门年初还为经济增长过热苗头担忧，年中却不得不将保增长放在政策目标首位；经济形势变化如此剧烈，令人震惊。但对明两年的经济增长率预期分别是10%左右和9%以下。

经济增长下滑的迹象主要集中在出口下降、中小企业生存困境、房地产市场趋冷等方面。并且，这些调整似乎尚未到底。短期因素的确难以解释，因为去年年底以来频发的自然灾害并未逆转经济增长的良好势头，显然，肯定存在着更为强有力的趋势性因素在起作用。如果不相信偶然巧合，我们需要一个大跨度视角来打量当前出现的各种困难。

中国经济此轮周期显然有着深刻国际背景。在改革开放的最初二十年中，中国较为成功地隔绝于全球经济周期之外。就是在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基本面也未明显改观。然而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大幅度融入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周期，出口占GDP比重翻了一番，外贸依存度达60%。在经常项目下，中国的实体经济已紧紧地与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了。而在资本项目下，我国已放开了大部分项目。无论如何，外资在近十年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大大提升了。

此轮经济增长上升通道的形成与开放背景下的流动性过剩有直接关系。一直以来，中国金融体系中都存在着大量的流动性，表现为银行的惜贷以及居民储蓄存款的膨胀，过剩的流动性仅仅反映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并未流到资产部门。正是在人民币升值以及上面提到的开放背景下，存量的流动性过剩开始活跃起来，货币流通速度开始加快，并开始进入资产部门。人民币在2005年实行一次性汇改和资产价格的随后启动绝非偶然。因而，我们看到，虽然央行成功地对冲外汇占款增加的大部分，但流动性过剩还是出现了。

当前经济增长的下行风险也契合了国际经济周期的转变。当前发达经济体均在经历不同程度的衰退周期，而新兴经济体也各有各的困难。在全球范围内，通胀风险的高企限制了央行刺激经济政策手段的使用。

由此，我们能得出的结论是，首先，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出现下滑不可避免，中国已无法游离在世界经济周期之外了。其次，经济下滑的持续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外部环境的改变。最后，国内刺激性的经济政策只能缓解经济下降，而不能改变经济周期。

那么，中国经济究竟会下滑到什么程度？这是当前大家对后奥运经济走势争论的另一种表述。笔者认同未来两年经济会有回调周期的判断，但认为幅度不会太大，并且经济回调与奥运会闭幕无关，这个趋势在奥运会之前就已出现，就像这轮经济增长高峰和举办奥运会的关系也不太一样。在即将到来的下降周期中，经济增长率应能维持在8%以上。这是一个合乎经济学理论和政策调控目标的增长率，也可能是个更为健康和可持续的增长率。

原因之一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都具备相当的稳定性。人们对出口的担忧最多，但出口下降幅度很有限，并且新兴经济体所占的比重有所增大；从历史数据看，政府调控对投资增速有明显影响，在经济下降通道中，投资将更多地凸显增长支柱的角色；与很多人相反，笔者对消费需求抱有信心，当前我国社会保障的发展正在消除家庭消费的担忧，对三农支持力度的明显加大也有望启动农村市场，最近的消费数据表的确令人振奋。

原因之二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引来一个战略机遇期，有望获得实质性进展。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由来已久，但至今收效不大，中国富裕的劳动力资源可能是原因之一。按照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决定最优分工。中国低成本的劳动力禀赋意味着，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是中国最具竞争力的产业。从微观企业的角度，资本回报率下降是推进技术进步的关键动力，而中国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使得资本回报率一直没有出现发达国家所经历的下降过程。这也就解释了为何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如此之难。随着人口结构转变的到来，这种增长模式将不得不开始转型。

然而，这只是提供了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要避免未来这轮经济增长周期下调过大，还需在以下许多方面有根本性调整。

首先是加快金融深化进程。金融部门是改革过程中积累风险最为集中的领域，中国经济转型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部门能否完成现代化转型。工行近日成了世界上最赚钱银行，这显然不能表明我国的银行业已建立起了一流的竞争力，就像在股市高涨时，工行成为世界上最贵的银行却并不表示它是最有价值的银行一样。相反，这可能反衬出中国金融部门的扭曲。其次，深化国有部门的战略性调整，进一步完善市场体制。有迹象显示，国有企业重组进程正在加快，这将是新一轮国资民进的过程；取消行政管理费等也象征着民营经济环境在持续改善。这个过程不像此前国有企业改革那样剧烈，但却是关键性的。再次，加大“三农”投入，并推动土地制度改革。中国二元经济色彩仍然浓厚，改革其中的体制障碍将提供新一轮增长动力。最后，我国的人口拐点即将出现，要延续人力资源优势就需要增加人力资本投资。

中国经济增长将进入一个下降周期，这或许不可避免，但下降幅度应该不会太大，我们有理由保持乐观。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财经专栏作者)

## 国际油价拉锯战背后的利益博弈



国际油价自7月11日站上147美元巅峰后，接连出现大幅跳水，一系列重要关口相继失守，除高盛和罗杰斯等坚定的少数派外，进一步看空一度成为市场的主流声音。但进入8月后，油价逐步在115美元左右稳定下来。

油价的起起落落，短期内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宏观经济数据、地缘政治和自然灾害因素的影响，特别是与作为主要计价货币美元的走势脱不了干系；但从长期看，供求双方的政策反应及其背后深层次利益考虑才是最值得关注的。

从需求来看，受次贷危机持续发酵影响，当前的美欧日经济放缓不同程度减少了对原油的需求；中国在奥运会结束后，能源消费需求也将有所下降，而燃油税和成品油价格改革方案近期若能顺利出台，将进一步抑制能源需求增长势头。不过，如果从一个更长的经济周期来看，美国经济早晚会复苏。如今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交替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手法已炉火纯青，2001年，美国陷入危机用了两个季度，走出危机也只用了两个季度。如果不出意外，一般预计，最迟明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就能重新步入增长轨道。届时，中国出口和投资的规模也将迅速扩张；同时，中国的重化工业进程远未完成，原油进口的上升趋势还要持续若干年。

从美国目前的政策思路来看，至少表面上是希望油价进一步回落的。毕竟，油价下跌有助于提振消费和投资，加速美国经济恢复的节奏，也能使夹在抑制通胀和刺激经济两难中的美联储得以从

“滞胀”阴影下解脱出来，以专心应付经济复苏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强势美元目前或许正是伯南克最需要的。然而，从其他经济部门角度看，强势美元却未必受欢迎，因为它增加了进口，抑制了出口回升势头，导致失业率上升。更重要的是，现在所谓的“强势美元”不过是之前美元超跌后的反弹，如果美元要想长期维持强势，正如里根时代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所做的，首先要一步应将利率提至高于名义通胀率——据美国劳工部统计，这一指标7月已高达5.6%，而这也显然不是眼下身陷苦恼中的房奴和众多投资者所乐见的。因此，要不要一个真的强势美元，或者说，想不想油价进一步下跌，在美国内部也存在利益冲突。

从原油供给方来看，主要分为两大块：欧佩克13个新老成员与以俄罗斯、墨西哥、挪威、巴西、哈萨克斯坦等为代表的非欧佩克国家。理论上，非欧佩克国家是作为欧佩克对立和竞争者形象出现的，在早期，每当欧佩克宣布执行“限产保价”政策时，不受限产政策束缚的非欧佩克国家往往趁机扩大生产抢占市场，这也导致欧佩克占全球原油市场份额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52%锐减至80年代中期的30%左右。不过，欧佩克的庞大储量和节制美德最终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一些非欧佩克国家原油储量日益枯竭，且难以承受扩大原油生产所需要的巨额投入；而另一些国家也逐渐认识到“限产保价”不仅符合欧佩克的利益，也是自身长远利益所在。基于以上考虑，2007年安哥拉和厄瓜多尔申请加入欧佩克阵营。

BP《2008年全球能源统计》显示，过

去三年，墨西哥、挪威等非欧佩克国家原油产出和出口都在逐年递减。今年上半年，非欧佩克阵营中的领军角色俄罗斯也加入限产的队伍，原油开采量同比下降0.8%，出口同比下降5.2%，同时还宣布重新调整原油出口关税。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欧佩克本质上是一个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卡特尔，欧佩克所有成员长期以来存在这么一个共识，即制定战略的最高境界就是让油价保持在一个足够高、但又不至于刺激原油消费国痛下决心彻底摆脱这种传统能源的水平上。无疑，这宛如在锋刃上行走，需要极高的科学智慧和政治艺术。正是在这样的思路指引下，今年6月，当油价首次突破140美元时，沙特暗示将日增产50万桶，并最终实际增产20万桶。在全球原油供求大致平衡的关头，沙特的理性选择显然有助于油价回归合理区间，避免整个原油时代的彻底瓦解；而当油价出现雪崩势头时，欧佩克的态度旋即转变，考虑减产。

笔者以为，相对于国际原油市场的需求方，博弈的另一方似乎有更大主动权和清晰的策略。可以说，欧佩克现在已掌控了全球原油生产的阀门。它所能影响的不再仅限于全球原油产量和出口量的一小部分，而是绝大部分。其中，稳坐储量和产量两把龙椅的沙特，其态度取向无疑具有风向标意义。或许在沙特和它的欧佩克同伴眼中，110至120美元是合宜的水平。至于它会不会继续往下走，则要看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会坏到什么程度。如果美国再次曝出几个“房利美”，那沙特也只剩干瞪眼的份了。

(作者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只能治市不能救市”的论调，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多市场化，骨子里则很荒谬。尽管中国股市目前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治市，但救市和治市并不矛盾。救市是为了更好地治市，并且，越是股市特别急切地需要治市时，往往也就越离不开救市。否则，如果股市治得好，还用得着救市么？如果一个病人大出血，不先动手去抢救，还等得及治这治那么？

救市即非市场化，偏见蒙蔽了一些人的眼睛，使他们不顾一切地一概反对救市。其实，只要不是生活在所谓市场化定理的真空，没有人会固执地认为救市就背离了市场化，不救市才是市场化。美国股市不是高度成熟的资本市场吗？可是，美国政府不仅历史上就救市，而且在当前接连发生次贷危机和“两房”危机之际，还大救特救其市。有谁说美国的做法是非市场化的呢？对于处在“新兴+转轨”期间的中国股市来说，讨论市场化还是非市场化，不能忘记一个重要前提：中国股市不仅至今还没有脱离政策市，而且沪深两市的由牛转熊除了市场本身内在的调整需要之外，政策主动挤压泡沫过度打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不反对打压股市，只反对救市，只能说明不救市论者的立场并非他们所标榜的是纯粹意义上的市场化，而是有偏见的市场化，或曰伪市场化。

市场所期盼的救市，是为了更好地走出政策市，但用政策之手纠正和弥补此前的政策错误，逆转“自由落体”之颓势，毕竟是走向市场化所必不可少的一步。在当前情况下，只有大胆救市，才有可能帮助市场恢复自救的信心。而对于

对中国股市来说，讨论市场化还是非市场化，不能忘记一个重要前提：中国股市不仅至今还没有脱离政策市，而且市场的由牛转熊除了本身内在的调整需要之外，政策主动挤压泡沫的过度打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不反对打庄股市，只反对救市，说明不救市论者的立场是有偏见的市场化，或曰伪市场化。

## Column | 专栏

## 对救市概念应有更全面理解



救市即非市场化，偏见蒙蔽了一些人的眼睛，使他们不顾一切地一概反对救市。其实，只要不是生活在所谓市场化定理的真空，没有人会固执地认为救市就背离了市场化，不救市才是市场化。美国股市不是高度成熟的资本市场吗？可是，美国政府不仅历史上就救市，而且在当前接连发生次贷危机和“两房”危机之际，还大救特救其市。有谁说美国的做法是非市场化的呢？对于处在“新兴+转轨”期间的中国股市来说，讨论市场化还是非市场化，不能忘记一个重要前提：中国股市不仅至今还没有脱离政策市，而且沪深两市的由牛转熊除了市场本身内在的调整需要之外，政策主动挤压泡沫过度打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不反对打压股市，只反对救市，只能说明不救市论者的立场并非他们所标榜的是纯粹意义上的市场化，而是有偏见的市场化，或曰伪市场化。

对于资本市场来说，只有当它的市场体系和运行机制适合市场的发展，人们才可以用正常的眼光去得出正确的判断和分析，也才有可能得到合理的投资回报。否则，就可能走向它的反面。痛定思痛

的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最近在谈到美国的经济危机时说：那些一出现过度繁荣的迹象就收回“长期”承诺的市场参与者，正在面临失去市场份额的风险。格老所说的“现在已被套上了枷锁”的市场资本主义，似更像是在说中国股市是“已被套上了枷锁”的市场化。因为正如格老所说，是人类在恐惧与兴奋之间摇摆的天性让我们陷入了经济困境。沪深股市比发生了次贷危机的美股跌得更深更猛，正是市场制度弊端越来越深刻地暴露出其背离市场规则之裂痕的反应。

当前的“维稳”本是针对“不稳”而言。没有“不稳”，又何须“维稳”？从近段时间沪深两市持续下跌行情来看，消极维稳的底线，无非就是“怕涨不怕跌”。而“怕涨不怕跌”恰恰是政策市的逻辑，不是市场的逻辑。按照这样的思路调控下去，就股市最基本的三大功能也将无可避免地受到严重的考验。那么，除了救市，可以说已经别无选择，哪里还有什么而纯的市场化可言？

市场所期盼的救市，是为了更好地走出政策市，但用政策之手纠正和弥补此前的政策错误，逆转“自由落体”之颓势，毕竟是走向市场化所必不可少的一步。在当前情况下，只有大胆救市，才有可能帮助市场恢复自救的信心。而对于



最廉价汽车，还是最麻烦汽车？

印度塔塔汽车公司今年初推出一款售价10万卢比(约合2500美元)的世界上最廉价小排量汽车，激发了印度许多普通民众的购车热情，也招来环保人士对超低价格车将加剧印度城市交通堵塞，加重环境污染的抗议。如今又有一批新的反对者加入进来，而这些人很可能最终会让塔塔公司迁走工厂。

## 私募股权投资：盼上海敢为天下先

◎李季先

上海市金融办、工商局、国(地)税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下发关于股权投资企业工商登记等事项的通知，标志着继天津、北京宣布要建私募股权中心之后，上海也正式加入了打造中国内地私募股权投资中心的行列。

作为一种全新的金融形式，发展股权投资基金不仅可引入各类长期投资资金，在区域内形成一批有影响力的股权投资企业，促进区域金融中心建设；而且还可以淘汰落后产能，改善区域经济结构、加速区域内企业向现代化企业转型。但“樱桃好吃树难栽”，对各个欲打造股权投资中心的城市管理者来说，如何通过“内在”努力使自己与其他竞争城市区别开来，进而实现这一金融布局构想却是个难题。

不妨以吸引股权投资企业入驻的重要因素之一的税收为例。由于同样受制于国家所得税法关于地方税的强制性规定，较之于此前京、津发布的同类税收政策，上海列出的普通合伙人按所得税率中“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税项目缴纳5%至35%个人所得税、有限合伙人按所得税率中“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应税项目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的条款，实际上并无明显区域税收优势。

那么通过鼓励和募股权投资企业对区域内国有企业参股、重组，或通过开业资助、控股股权投资等产业扶持扶持是否可行呢？答案也并不乐观。一方面，政府对某些国企的重组意愿可能与股权投资企业的投资意愿产生错位，股权投资企业往往基于自己的风险控制考量而不得不放弃某些投资；而另一方面，各地政府也有各自的区域发展构想，不可能完全满足股权投资企业的完

全市场化操作政策建议，两者相持之下，如果没有极佳的政策安排，地方股权投资的产业政策对股权投资企业的政策内耗恐难以避免。

美国等国家的私募股权投资发展经验表明，发展私募股权投资既不是比拼税收优惠政策，也不是比拼产业政策的优惠度，而是靠稳定、可预期行为后果的私募股权投资政策、及时顺畅的股权投资退出机制和股权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尤其在中国，避免双重征税、及早建立创业板市场等股权投资退出渠道更是发展私募股权投资的应有之义，上海有责任也有能力通过创新股权投资机制在全国率先建成私募股权投资中心。正如许多私募股权投资者所说的，看一个地区是否适合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在根本上是看其股权投资的整体法律运作机制是否科学有效，是否可以让私募股权投资者有法律许可的方式控制风险，譬如完善的股权投资法律法规和有创业板、新三板等退出渠道。这决定了上海市可以依托区域优势和相较于成熟市场国家的后发优势在地方权限范围内进行自我股权投资机制创新，在打造股权投资中心方面比其他城市做得更好。

从长远来看，打造股权投资中心一定要有宏观视野，要与国家经济的发展规划联系起来，与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联系起来。在这方面，上海要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自觉进行股权投资退出机制创新、争端解决机制创新，要逐渐减少靠给股权投资企业“超常待遇”来争夺股权投资企业入驻的做法，扎实提高上海自身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在国家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整体经济战略布局下，以人才、法治的整体环境吸引私募股权投资企业，应是上海实现城市经济良性发展的“硬道理”。

## “刑上老鼠仓”为股市治黑铸利剑

◎刘效仁

8月25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拟新增条款，严厉追究金融从业人员“老鼠仓”行为的刑事责任。当事人可被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将被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笔者以为，这是中国股市为了健康发展而治黑治乱的必然选择，值得鼓而呼之。

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及其他未公开的经营信息，违反规定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交易活动，或者建议他人从事相关交易，历来是股市之大忌、大敌。同时，亦是海外股市重点打击严厉惩处的对象。2月16日，香港行政会议成员及立法会议员、东亚银行主席李国宝因涉嫌透露内幕消息，正式向特首曾荫权辞呈。李国宝称，自己被SEC以内幕交易罪起诉，19人都被判有罪，3人因罚款而破产。我国对内幕交易者仅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3万元的，处以3万元以上60万元以下的罚款，轻者重处，不言自明。

因刑法没有针对相关行为的规定，所以难以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上投摩根基金公司和南方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唐某、王某虽因违法违规投资牟取私利被查处，但证监会仅仅是对其两人开出罚单并实行市场禁入，而因为实行举证倒置，仅此“控方举证”一条，足以将绝大多数内幕交易的指控消弭于无形。“刑上老鼠仓”，为股市治黑铸就了一把利剑！